

高考记忆与电子人生

金晓干

1987年夏天,阳光炙烤着永康,也炙烤着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学子。在那个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的高考年代,浙江省的高考竞争尤为激烈。

永康一中的教室里,即将高考的学子夜以继日地与题海奋战。而我正是这场角逐中的一员。

高考前夜,我在床上辗转反侧,焦虑难安。凌晨一点,父亲递来半颗安眠药,这才勉强入睡。

第二天上午考数学。拿到数学试卷的那一刻,我迫不及待地翻到最后一题,想看看传说中的压轴题到底有多难?映入眼帘的题目让我惊喜万分,这道20分的题目,竟然和数学辅导书上的题一模一样!我一阵狂喜,又不敢相信,以为是做梦,打了自己一个耳光,继而迅速冷静下来。我怕头脑一热忘了怎么解,就从最后一题做起,凭借记忆中的思路一气呵成。啃下最后一题后,我再笃定地回到第一题,平静地完成了整张试卷。最终,数学成绩位列全市前三。

这份幸运仿佛打开了胜利之门。在化学考试中,我又惊喜地发现最后几道题与辅导书极为相似。凭借着平时对这些题目的融会贯通,我顺利完成作答,最终化学取得93分(满分100分)。

数理性的出色发挥,让我在考场上一路披荆斩棘,但语文依旧不及

格。作文是我弱中之弱。考前,我背了很多篇范文。我想不能白背,即便离题万里,还是生搬硬套了上去。

高考的三个不眠之夜,我每天仅睡两三个小时。当最后一门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,整个人仿佛被抽干了所有力气。父亲让我去医院注射葡萄糖。这种极致的疲惫与紧绷,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。

高考结束后,紧接着便是填报志愿的重要环节。那时的志愿表都是手写的,为了让字迹更加工整美观,我请父亲代笔填写。

因为对电子专业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,我的志愿栏清一色填满了电子类专业。不仅如此,在服从调剂一栏,我赫然写下“不服从”。这份破釜沉舟的决心,源于五岁时钻火车底研究机械的痴迷,也源于六岁时拆装外公闹钟的执着。

我是一个小镇做题家。我又不仅是个做题家,我有我的热爱和思考。

命运总是青睐有准备且勇敢的人。当时,上海工业大学(现为上海大学)电机系主任来杭州招录考生。他看到我的志愿表上那一句“非电子类不上”的宣誓,又被父亲的一手漂亮字迹所吸引,最终决定优先录取我。

后来,系主任说看了这么多的志愿表,唯一在我的志愿表上看到了“非

电子类不上”的备注。他一下子被打动了。读了大学后,我的确没有让老师失望,高数免修,普通物理也在全校1200名学生中名列前茅。

只是,当班主任让我出黑板报时,我的一手“鸡爪字”露馅了,只得如实招供志愿表是父亲代为填写的。

30多年过去,那个在高考志愿表上写下“非电子类不上”的少年,如今依然坚守在电子行业。我们这届电子专业全班35人,从毕业至今,一直从事电子研发行业的只有我。我也曾斩获多项科技进步奖,是汽车电子某项国家标准的起草人之一。

从校园到社会,考场的形式在变,但那份专注与执着从未改变。我始终恪守老校长“自强不息”的校训,在这个浮躁的时代,坚守着工科生应有的踏实与严谨,用一个个良心产品诠释着实业报国的理想。

1987年的夏天,不仅是我从永康到上海的突围,更是一个少年对热爱最纯粹的坚守。

人到中年,记忆里的高中生活依然鲜活,高考的焦虑依然时时潜入梦境。正是那段咬牙坚持的岁月,让我明白人生所有的收获,都需要一种高度的专注和漫长时间的淬火。

高考的学子们,若你决定灿烂,便是山无拦,海无遮,去勇敢追梦吧!

师者如灯

黄宗海

你怎么跑永康教书去了?
曾任宜黄县打谷机厂销售主任的表舅说。虽说明珠学校外省市老师不少,但只要永康籍老师凑到一起,他们便会用那令我蒙圈的永康话交谈,我们这些外人只能落寞地走开。

在我满腔热情地尝试着做些陈亮文化普及工作时,我对陈亮的认知、解读很快进入“瓶颈”。我反复研读了时任明珠学校副校长林祖喜推荐的方如金教授访谈录《穷陈亮,富陈亮》一文,这是徐天送老师写的。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我拨通了时已退休的徐老师的电话。那次令我激动不已的通话,现在只记得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的回复:“你好!你好!好的,好的”。

如约到徐老师发挥余热工作的地方永康锡雕博物馆时,一个慈眉善目、满面红光、精神矍铄的中年人给我开了门。当得知我要找徐老师时,他爽朗地笑道:“你好!你好!我就是。快里面请”他怎么这么年轻,不是退休了吗?但那略微熟悉的声音告诉我,没错,眼前这位看着比我大不了多少的

中年人就是我要找的徐老师。当弄明白我的困惑后,徐老师说:我觉得有些方面你不妨直接向方教授请教,你看如何?在得知他愿意把我引荐给方教授时,感佩之情油然而生。

奖掖后学,不分南北。为了确保我能顺利搭上方教授的线,徐老师不只在电话里替我说了许多好话,更在百忙之中拨冗亲自带我至金华丽泽花园方教授家登门拜访。徐老师不只对我,对来自外省的其他老师,同样关爱有加。

深耕教苑,培桃育李。因了徐老师的分享,我也关注他的高徒,曾经主政一方,被百姓亲切地称为“强哥”的文章。从“强哥”另辟蹊径每年利用浦商清明回乡祭祀之机召开浦商大会,“强哥”在第二届浦商大会上作的主题发言《杜鹃红了山岗,你是否已在回家的路上》,就不难理解为何他当得起百姓的“强哥”之称。据我所知,“强哥”的成长离不开徐老师的谆谆教诲和殷殷关切。金华总工会董英杰先生在《我的语文老师徐天送》中深情回忆道:他谈吐风雅,语气平和有力,颇有学者之风。

徐老师并非班主任,教导我们的时间也仅一个学期,仍对我的认知产生很大影响。

著书立说,嘉惠后人。当我把从徐老师赠我的“宝贝”《品味永康话》《永康话与永康文化》中学来的“没工夫”等来自永康话的词汇在课堂信手拈来秀给学生时,我与学生间因方言不通等原因拉起的距离在缩短,终至其乐融融。在我一再有意而为之地以浙江省精品课程《陈亮诗文选读》为依托,关联永康状元公陈亮文化的作用下,学生们对陈亮的认知逐渐由抽象到具体,濡染了陈亮百折不挠、自信自强精神的学生们变得更加阳光向上。

德高望重,耽于思索。身为市诗词学会副会长的他,不仅诗词了得,在楹联领域也是大咖。作为市梅园公益阅读协会顾问的他,还时常与会员们一起到乡村文化礼堂,深入企业文化大讲堂,进入学校会堂参与阅读推广公益活动。在花川村智慧图书馆首届读书分享会上,徐老师馈赠墨宝,不敢妄为些子事,只因曾读数行书,劝勉之情溢于言表。

交往多了,我对徐老师也有了更深的认知。他不仅在教苑育得桃李芬芳,在学术领域也是硕果累累,更写得一手圆润中自带刚劲的好字。而今,陋室书房东墙悬挂的徐老师题赠墨宝“以书为友,时刻鞭策着我”。



鸿运当头 王福强 摄

忆往昔高考

胡美霞

我命由我不由天!这句话从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中的混世魔王哪吒嘴里咆哮而出后,瞬间点燃了一代人的生命希望。

我也不例外,虽然我看电影之时,已近天命之年,内心仍然是澎湃的、激動的。在我看来,哪吒不仅叛逆,更是活出了自我,说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,做了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。

我出生于普通农村家庭,排行老二,上有兄下有妹。兄长是长子,拥有父辈独有的偏爱。我妹小我两岁,有股不服输的劲,她认定女子不会不如男。所以,小时候,她的性格大大咧咧,她在家里家外都是受欢迎的,学习成绩又好。而我,是一个透明人。村里人,但凡跟我打招呼的,一口一个我妹的名字,而我尴尬得应或不应都不是。

上了初中,突然间,老师指名让我当班长。班长之职,从天而降,我有点飘。初一初二,我虽然当上了班长,却没有珍惜机会,反而虚度了光阴。初二学期结束时,我突然意识到错误,想复读一年,最终没有如愿。

我按部就班地上初三,努力向上,然为时已晚。我终究考不上县城里的重点高中,只能到镇里上普通高中。

那时,上普通高中,意味着很难考上大学。于是,我选择文科班,只是因为文科班考取大学的几率比理科班少之又少。因此,如果我考不上大学,也就没有什么难为情了。

高中三年,我不是很用功,但也没有放弃学习。我在班里是中等生,三年下来,几乎得不到老师的关注。我父母都为我想好了高中毕业后的出路:到上海,跟着姑姑做裁缝。万一高考落榜了,手无缚鸡之力的我该干什么?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。

然而,高考之后,命运齿轮开始转动。当年高考填志愿,是先估分、再填志愿后出分数,不同于当下。高考填志愿,是我一个人完成的,没有父母提意见,没有同学可参考。我凭着母亲的一句话:杭州有一亲戚,且杭州离家近些。于是乎,我每批志愿都填上了某大学及与之有关的大学。

放榜那天,我居然被某大学录取了。我当时有点蒙,我所在的那个班当年只有4个同学上线。而我,一度嫌弃专业不好想要弃学复读。父母亲不同意,理由是上大学“农转非”,一个居民户口值2万元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,2万元的确不是小数目,况且我

复读能否考得更好,也是未知数。

就这样,我顶着四合院里第一个考上大学及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头衔,去读大学。大学时光一晃而过,很快到了毕业找工作的阶段。

我当时不想上大学,跟母亲说大学专业不好毕业后不好找工作。母亲为了让我安心上学,随口说了一句:“工作我们来找,你只管去读大学。”于是,毕业了,我就拿这句话去堵母亲。而母亲是只知下地劳作的普通农村妇女,当时已届知天命之年,为我的工作日思夜想,四处求人想办法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终于有一天打听到有一单位在招工,母亲急忙让我去报名。当时的我一点也不情愿,来掩饰我的不自信。报名就报一下吧,我心想着,也没有多大期望。一路走来,虽有波折,但顺利过关,走上了当时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。

现在回想起来,我感谢高考,它让我跳出农门的同时,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时至今日,高考不再是跳农门的跳板,亦不是改变人生的利器。然而,高考依然是学子无法跨越的阶梯。

高考来临,唯愿学子们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绩,不辜负多年努力!